

# 歷史人物荊軻形象的還原分析

孟 蒙

郭嵩燾在《史記劄記》中說：“史公之傳刺客，為荊卿也。”司馬遷一篇六千餘字的《刺客列傳》，單用在荊軻一人身上就有三千字。在如此大的篇幅之中，司馬遷生動而立體的塑造了荊軻的形象。荊軻從此躋身于歷史著名俠客之列，被人們當作中國古代俠客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史記·刺客列傳》中記載的荊軻形象是複雜多面的。遠遠比普通遊俠的個性要複雜立體得多。愛·摩·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裏面提到人物的時候說：“一個圓形人物務必給人以新奇感，必須令人信服。如果沒有新奇感，便是扁平人物；如果缺乏說服力，他只能算是偽裝的圓形人物。”《刺客列傳》裏的荊軻就是一個圓形人物，他性格豐滿、情感豐富細膩。在歷來對荊軻的研究中，往往把目光局限於他的歷史著名遊俠的地位，而忽視很多他身上一般人的性格特徵。本文將立足於《史記·刺客列傳》，把荊軻的形象進行還原。

在《史記·刺客列傳》中，敘述了幾件荊軻的小事：

荊軻嘗遊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複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荊軻游于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

從上面兩段話可以看到：面對正面爭鬥，荊軻一般採取逃避態度。

荊軻並不勇敢直率，跟韓非子所說的“以武犯禁”的俠客相去甚遠，他的言行，更像是“克己復禮”的儒生。

歷史上有很多評論家把荊軻的退縮看作是“大隱”，郭嵩燾《史記劄記》稱荊軻“能忍，不以小憤櫻心”，但這種對正面衝突的逃避並不是俠士應有的態度。武藝高明的俠士碰到一起，少不了磕碰切磋，但是荊軻的“嘿然逃去”顯得有些懦弱。這種逃離與其把它說是“隱忍”，更像是一種對衝突的畏懼和對失敗的逃避。俠士通常都是勇敢強悍的，他們性格激烈，動輒就刀兵相向，同時也是不畏艱險勇於挑戰的。豪俠的“尚武”精神一直為主流意識所推崇。鮑照寫道：“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代結客少年場行》）他們連“十步一殺人”（李白《俠客行》）尚且不懼，更何況是俠士之間的武藝切磋呢。

荊軻的猶豫和退縮不僅是表現在面對正面爭鬥的時候，還體現在接受刺秦任務的幾次猶豫中。

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

第一次是田光相求，“欲自殺以激荊卿”，荊軻面對田光的死依然無動於衷；到太子“避席頓首”親自陳述原委苦苦相求，荊軻仍然推脫說“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直到“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荊軻才“然後許諾”。在《史記刺客列傳》裏，聶政對嚴仲子的請求也曾經有過推脫，他在故事開端拒絕了嚴仲子的黃金百鎰和刺殺俠累的任务。但這種推脫是出於一定原因的。當時聶政老母尚在，姐姐聶荑未嫁，刺殺有風險，一旦被認出會直接連累到家人。這種推脫是情有可原的並且更加彰顯了聶政的豪俠風範。

推敲荊軻的一再推辭，有一些出於現實的原因。

首先，刺客列傳中說荊軻“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可見荊軻是希望能靠自己的文才武功取得一定的社會地位的，但是刺殺是一項特殊的任務。在《刺客列傳》前面四個故事裏，專諸“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說明專諸雖然刺殺成功，也被吳王僚的親衛殺死；豫讓在幾次報仇未遂之後伏劍自殺，而即使他不自殺，也會被趙襄子殺死；聶政死的最是慘烈：“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四個故事裏面除了曹沫沒有採取刺殺而是要脅的方式免於一死，其他三人都以各種形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荊軻的情況更為特殊，他所要面對的刺殺物件是統一了六國的秦王，是天下最大的王者。即使刺殺成功，荊軻也逃不過數以千計的秦國士兵，死是必然的結果。而對於想要出仕的荊軻，這並不是最好的歸宿。

但是，俠士是應該具備“士為知己者死”的大義風範的。換做是聶政專諸，情況就會大為不同。他們都是有著“士為知己者死”精神的俠士，把為了主人付出生命當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聶政甚至是從一開始就冒著必死的決心的：

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

聶政拒絕有人協助就意味著他已經下定決心赴死，並且絕對不洩露自己主人的任何資訊。到最

後義無反顧的“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更是用慘烈的死法來捍衛主人的安全，這些刺殺和自殘的動作一氣呵成，可見聶政早已策劃好自己的死亡。從聶政接受刺殺的任務到行動，沒有一點猶豫。

而荊軻不僅是缺乏“士為知己者死”的豪俠精神，甚至缺乏俠士應有的同情心和仁義之心。在接受刺殺任務前，他面對田光的死亡顯得無動於衷，而接受刺殺任務後，更是把別人的生命牽扯進來，勸說樊於期用自己的項上人頭作為刺秦活動的保障。

到荊軻應允下來刺秦之事，又經歷了幾次猶豫。先是接受太子丹提供的富裕的物質條件：

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然後遲遲不肯行動，“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直到“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坐不住了，前去催促荊軻，荊軻才提出自己的要求：“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如果只是因為缺少樊於期的人頭和地圖而久拖不決，為什麼一定要等到享受了美食女色，甚至眼睜睜看著秦軍進逼到燕國土地之後才提出？這種行為更像是一種對災難的逃避和對死亡的恐懼。

對比荊軻接受太子丹物質饋贈的做法，別的俠客要質樸得多，聶政拒絕嚴仲子饋贈的黃金，豫讓為了刺殺趙襄子甚至自毀形貌，沿街乞討。俠客裏面在這方面著名的還有漢朝的朱家，《史記·遊俠列傳》記載朱家為了救濟別人“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鞦韆。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荊軻與之相比，就更加顯得自私而畏難了。

另外，如果說荊軻對刺秦的拒絕起初是出於對獻身的猶豫，那麼接受任務之後是完全不應當猶豫的。既然任務已經接受，就相當於接受了獻身的最終結果。就更加顯得過分優柔。

基於上文的分析，司馬遷在荊軻的性格塑造上有其獨特的思考。他並不想把荊軻塑造成一個“標準”的俠客，而是要塑造一個性格生動立體的歷史人物形象。比較其他俠客形象，其性格特徵都要比荊軻單一一些。曹沫的當機立斷，豫讓的忍辱復仇，專諸的忠誠勇敢，聶政的大義大勇這些特點都是非常顯著的，也是很符號化的。他們更接近於愛·摩·福斯特所說的“扁平人物”，《小說面面觀》裏面提到：“他們用最單純的形式，就是按照一個簡單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創造出來。”司馬遷對這幾個人著墨不多，只敘述了能夠突出人物特點的重大事件和某些特殊場景。但對於荊軻，司馬遷不僅詳細敘述了刺秦活動的整個策劃和執行過程，而且還敘述了荊軻接受刺秦任務之前的一些生活片段。可見司馬遷對於荊軻刺秦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重視。考查司馬遷的寫作動機，大致是出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出於對刺秦王事件的重視。由於刺秦王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使得荊軻成為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刺客。司馬遷對於秦王朝的興衰一直給予高度的重視，在《刺客列傳》裏敘寫荊軻時，司馬遷

對於秦王朝的視角有一個特殊的轉換，從被滅六國而不是旁觀者的心理角度來審視秦王朝的興起。

二是出於對荊軻刺秦王事件失敗原因的思考。這個問題古往今來有許多爭論，司馬遷也自有自己的觀點。從他塑造荊軻形象的動機可以看出，他很重視探索荊軻的性格因素在刺秦王事件中的重大作用。還原荊軻的歷史形象，能夠表達作者心中一些對人性的思考和對歷史重大事件成因裏面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探究。

那麼荊軻性格特徵到底複雜在何處，又是怎樣與刺秦王事件的整個過程聯繫起來？

《刺客列傳》裏對荊軻的特點有一些直接的描述：

荊軻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

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築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深沉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由此可知荊軻不僅是一個俠客，還是一個文人。他“好讀書”“為人深沉好書”，和高漸離一起擊築高歌。可見他的性格裏面包含文人和俠客的雙重因素。呂思勉《秦漢史》裏說：“好文者為游士，尚武者為遊俠”。荊軻既好文又尚武，是游士和遊俠的綜合體。

這種性格特徵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社會背景。汪勇豪《遊俠人格》裏說：

本來，古代所謂士，大都是武士，如前所說，平居時為卿大夫家臣，統馭百姓，戰時執干戈以衛社稷，並無嚴格的文武之分，他們都要學“六藝”，“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在庠序學校，接受全面的培養和鍛煉。然而依各人的情況，總有長於文章辭令和長於射禦攻戰的區別。前者發揮其所長，宣揚禮儀教化而成儒，主張兼愛非攻而成墨，鼓吹現時功效以幹時主而為縱橫家；後者發揮其所長，則為奮死無顧忌的勇士，乃或替人打仗、任氣尚義的俠士，是很自然的事。

由此我們推知，荊軻應該也是在庠序之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先秦時期學校學習“六藝”，包括禮、樂、射、禦、書、數六門，文武皆有，荊軻應該是武功略微比文才高一些的人。因為《刺客列傳》中說荊軻“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這裏的“術”就是劍術。由此可見，荊軻和很多遊俠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他是出自於正規教育，而不是出自於市井之中，也就是所謂的“布衣之俠”；另外，他和別的同樣是出於正規教育的俠客相比，要更加擅長“文”的方面，因為他“好書”。出於市井之中的俠客有很多，《史記·遊俠列傳》之中提到的漢代朱家、郭解都是。出自正規教育的俠客最著名的都是出自先秦重視教育和人才的環境之中，典型人物如曹沫、專諸、豫讓這些人，他們都是

王侯身邊的武士，曹沫甚至還帶兵打仗，沒有經受過正規教育是不可能進入王侯世家擔當重任的。在《刺客列傳》裏，並沒有單獨說荊軻的劍法如何高明，而是把荊軻的好文和好武並列起來寫，可見司馬遷是把荊軻的好文當做重要的性格因素的。因為荊軻的好文，所以帶有很多文人特有的性格特徵。

首先是講禮。禮作為六藝之一是接受過正規教育的人的必備素質。《論語·顏淵》裏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講的是做事做人都要有禮有節，不能超越界限，不能魯莽行事。回過頭看荊軻對正面衝突的回避，一次是“蓋聶怒而目之”，還有一次是“魯句踐怒而叱之”，兩次都是到了對方“怒”的程度，武力鬥爭一觸即發。在這種情況下，荊軻選擇“嘿然逃去”，是出於回避爭端，講求不越界，不過激的考慮。《論語·先進》裏講做事情要講求分寸：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講的也是做事情要講究分寸，既不能做得不夠，也不能做得過激。因此，除了對衝突的回避，荊軻和其他俠客比起來，那種激烈的個性要少很多。對於王侯的知遇之恩，理性的思考也要多於感性的回報。同樣，荊軻這種文人特有的謹慎態度也是他遇事猶豫再三的原因。

刺秦王任務艱巨，只能一次成功。而任務本身除了危險性大之外，其實更重要的是它的歷史意義。

首先，刺秦王是燕國挽求危亡的最後一絲希望。吳見思《史記論文》中說：“此時之燕，刺秦王亦亡，不刺秦王亦亡，太子丹所以刺秦王也”。當時秦已經拆散了燕趙聯盟，之後“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燕被秦國統一已經是必然的歷史趨勢。在這種情況下，燕國採取這種形式的反擊不僅僅是最後一搏，最重要的是這種行為裏面凝結了太多的仇恨，這種仇恨不僅是來自太子丹一個人，也是來自于被秦逐漸瓦解吞噬的六國。太子丹之前被當作人質扣留在秦國，受盡屈辱，後來偷跑回燕國，對秦國有著刻骨的仇恨。這種心態不僅是太子丹一個人有，遭受秦國蹂躪侵略的六國也有著同樣的感受，而刺秦王的動機就是在這樣的情緒下形成的。這一點在《刺客列傳》裏面也有提到。荊軻刺秦王失敗後，文章還追加了荊軻好友高漸離進一步實施刺秦王的故事。在高漸離也失敗之後，秦王“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可見對於諸侯六國的刻骨仇恨，秦王是深有畏懼的，反過來證明了諸侯國仇恨心理的普遍存在。因此，刺秦王的任務裏面，背負著太多的國家仇恨。

其次，刺秦王成功與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寫歷史，雖然當時的六國敗局已定，但是一旦刺秦王成功，正在面臨的危機就可以被暫時緩解。雖然當時秦的實力已經遠遠超出其他諸侯國，但這種僥倖心理仍然是普遍存在的。荊軻作為一個文人和俠士的綜合體，對時局的考慮要比一般尚武的俠客更加深入一些。中國古代的文人有關心政治的傳統，同時也是統治集團的重要成員，對於當時

的政治局面，荊軻是有所分析的。面對如此之重的負擔，他產生了一定的逃避，也是情理之中的。

荊軻與其說是一個能文的俠客，不如說是一個能武的文人。因為他的性格因素裏面，文人的成分還要更加明顯一些。《刺客列傳》中說“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沉深好書”，“深沉好書”是司馬遷描繪荊軻時的基調，是荊軻性格的基礎。文中還說“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這種狂放不是“十步一殺人”（李白《俠客行》）的尚武的狂放，而像是“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文人式的狂放。李國文《文人的性格》裏面談到：“所以，這世界上的文人，狂者多；不狂者少，絕對不狂心如止水者，幾乎沒有。因此，狂，也就成了文人的標誌特色。”

荊軻的狂表現得最典型的一幕就是在刺秦失敗後破口大罵的一幕：

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

這一幕尤其突出了荊軻那種文人式的狂放。歷史上幾次這種有名的大罵，都是出自于狂放的文人，比如《三國演義》裏面有名的禰衡擊鼓罵曹：

操曰：“汝為清白，誰為污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吾乃天下名士，用為鼓吏，是猶陽貨輕仲尼，臧倉毀孟子耳！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耶？”

對比兩次大罵，相同點頗多。首先是兩人都擺出了極度不雅的姿態。荊軻是“倚柱而笑，箕踞以罵”，禰衡是“裸體而立，渾身盡露。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著褲，顏色不變”。另外罵的角度也有相同點，都是從褒揚自己的角度出發的。荊軻是“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為自己的失敗找理由；禰衡就更是直接，那一句“吾乃天下名士”，直接說明了禰衡自視甚高的性格。李國文先生是這樣用一種很幽默的方式解釋文人的狂放的：“狂是文人膨脹的結果，是成就感難以抑制的發洩，只要對別人不構成觀瞻上的不舒服，感覺上的不自在，心理上的不抵觸，精神上的不討厭，我們沒有理由不允許人家自我感覺良好。”

荊軻是完全有基礎擁有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態的。《刺客列傳》中說：“荊軻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還說“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可知荊軻才華甚高，所以四處“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希望能夠一展自己的文才武功。由於刺秦決定了自己的命運，而在最後一刻面臨自己的失敗，荊軻面對著失敗又不甘心的尷尬處境，在臨死之前為自己找到了一個理由。

回歸司馬遷塑造荊軻性格的意圖，有一部分原因是要把荊軻的性格及其悲劇命運聯繫起來。《刺

客列傳》中也有從不同角度分析刺秦王失敗的原因。裏面提到魯句踐聽說荊軻刺秦王失敗，私下說：“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這是從劍術不精的角度來說的。司馬遷雖然在結尾說“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主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但是從他對荊軻性格描寫的細膩程度上來看，他也一定程度上把荊軻的性格因素作為影響刺秦王事件的重要因素來寫。正因為《刺客列傳》中的荊軻是一個如此形象生動性格豐滿的人物，是一個活生生的性格複雜的人，而不是像很多小說之中被神化了的俠客，才使刺秦王的失敗變得更加情有可原。

## 結 語

荊軻刺秦王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因為司馬遷對他性格的生動描述變得更加貼近歷史，也更加意味非凡。

作為一個被後來的許多文學作品神話了的歷史形象，荊軻在《刺客列傳》中是比較真實立體的。太史公司馬遷的細膩深入的文學構思，把讀者從快意恩仇的江湖幻想中拉出，面對更加有血有肉的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形象。

(中國傳媒大學)